

XXXX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信用经济焦虑：《罗克珊娜》中的政府信贷、道德情操与自由市场

陶久胜¹，殷博²

(1.海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2.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18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格兰议会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建立了永久性国债,制度化金融与信贷业务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商业发展,但也引发国民对政府信贷的担忧,认为信用经济缺乏实际价值,股票市场无序扩张与政府信贷滥用会带来严重社会危机。《罗克珊娜》中,同名主人公正如当时所有积极参与信贷业务的欧洲商人一样,精心塑造个人良好的道德与经济形象以增加个人信用,她成功的商业实践展示了信用经济魔法般的财富增殖能力,也表现了理性经济人的道德情操对信贷市场的重要作用。笛福通过罗克珊娜的婚姻抉择与婚配对象的法荷国家形象正反隐喻,透视政党斗争自英格兰议会蔓延至伦敦交易巷的事实,暗示政府捍卫信贷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表达英格兰社会对政府信贷与股票市场的焦虑。

[关键词] 《罗克珊娜》;丹尼尔·笛福;信用经济;道德情操;自由市场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5886/j.cnki.hnus.202603.0496

在一份载明金额的“同居书面契约”签订后^{[1]41},罗克珊娜(Roxana)开启了作为“职业情妇”的生涯,且成长为一名成功的信贷商人,甚至化身为“信用”本身。作为商人,罗克珊娜亲自“打理业务”^{[1]131},凭借“抵押贷款”与“可靠的投资”在伦敦政商界炙手可热^{[1]64}。作为“信用”化身,罗克珊娜展现出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几乎所有与之邂逅的男性都会立刻为之沉迷,如泡沫时期狂热的投机者般争相“投资”她。这位“信用女士”的经济成功,既有赖于车马华服与刻意隐匿的历史来塑造良好的个人“信誉”,又在于她拒绝成为近乎“高级仆人”的妻子,转而选择成为在市场中享有“绝对自由”的情妇^{[1]148,171}。这似乎证实道德声誉与商业自由同为信贷市场繁荣的必要条件。然而,当罗克珊娜沉迷于“奢华热闹的宫廷”这个“新领域”时^{[1]172}，“信用女士”便面临被特权与党派纷争“滥用”的风险。当被抛弃的女儿携带不堪的过往“如乌云般聚拢而来”^{[1]296},女主人公便如同鼓吹谎言的泡沫公司一样遭受破产。

这是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小说《罗克珊娜》(*Roxana: the Fortunate Mistress*, 1724)中的情节片段。克里斯蒂娜·希利(Christina L. Healey)将小说置于南海泡沫时期社会的焦虑与不确定情绪中考察,认为笛福通过书写罗克珊娜的投机行为与最终覆亡,反思了冒险资本主义背后潜藏的风险与危害^[2]。桑德拉·谢尔曼(Sandra Sherman)则把笛福早期作品中的“信用女士”(Lady Credit)与晚期小说中的罗克珊娜并置起来讨论。她认为,前者的塑造有意凸显了叙事的不确定性,是用以阐释复杂多变的信用市场的媒介;而后的悲剧性结局则揭示了南海泡沫时期社会对于不确定性事物的普遍焦虑^[3]。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小说如何呈现18世纪早期英国新兴信用经济及其伴生的文化危机,但较少从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思想的角度,关注笛福作品中的信贷市场与信贷滥用问题。基于此,本文将立足于18世纪早

[收稿日期] 2026-04-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28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1AWW008)

[作者简介] 陶久胜(1976-),男,江西高安人,文学博士,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期英国金融革命时期的信用经济话语，考察罗克珊娜在小说中的信贷实践及其悲剧结局，揭示道德操守对于信用经济健康的重要意义；同时剖析小说中暗含的信贷市场自由主张，解读18世纪英国社会对于党派纷争和专制特权引发信贷滥用问题的深层焦虑。

一、18世纪英国金融革命、南海泡沫与信贷话语

笛福在经济学著作《创想论》(*An Essay upon Projects*, 1697)中满心欢喜地宣称英国已进入“创想时代”(The Projecting Age)^[47]，专利申请与公司创办等“创想”在股票投资热潮中激增。笛福敏锐地捕捉到了该时期的新商业现象：汇票与债券等工具交织起庞大的信用网络，银行业务与国家财政塑造新金融体系，交易巷内的股票投资业务炙手可热。1688年光荣革命既为英国带来了掌握财政大权的议会，也为建立稳定的国家信用体系提供了政治保障；但这也使英国卷入旷日持久的欧陆战争，庞大的军费开支使新政府陷入财政危机。为疏解困境，英国效仿荷兰经验，于1694年特许成立英格兰银行，由其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以维持国家战争机器运转。作为回报，英格兰银行获得了发行作为纸币的银行券、汇票与经营存贷款业务的特权，并依托国家财政背书，以税收为担保发行国债。这样一来，由英格兰银行发行的国债变得十分安全可靠，自然成为受社会追捧的投资对象。由此，社会的闲散资金被有效地调动起来，汇集成为支持国家战略的资本。国债的吸引力并不只在于其相对稳定的利息收益，还在于它具备较强的流通性，投资者可以较为便利地在市场上买卖转让。由国债交易所激发的投资热情，又进一步推动各类公司借助股票发行来筹集资金。这场以英格兰银行成立、国债开端与股票市场繁荣为核心的经济变革正是皮特·迪克森(P. G. M. Dickson)所称的“金融革命”^[5]。在18世纪，伦敦交易巷的咖啡馆总是人声鼎沸，国债与大大小小各类公司的股票在其中频繁易手，人们沉浸在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最初兴奋感中。可以说，银行与股票投资滋养了笛福所说的“创想”精神，而这种精神也反过来“勤勤恳恳地为其养育之母效劳”^[416]。

英国金融革命所催生的信用经济，不仅提高了国家战争融资效率，也成为推动贸易繁荣的润滑剂。进入18世纪以后，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持续时间也明显延长，财政能力因此越来越直接地关系到国家的军事成败。1667年，英国曾因财政资源不足而在与荷兰的冲突中遭受重挫，不仅港口失守，皇家军舰也遭掳走；然而不到一个世纪后，英国已能在七年战争中同时于四大洲同法国交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确立其殖民霸权地位^[61-2]。如此显著的转变，与英国“财政-军事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高效的文官体系，较为完备的税收制度，以及公共债务机制，共同构成了支撑国家权力扩张的“权力的肌腱”^[7]。不同于风险较高、稳定性较差的王室借债，英国国债以税收收入和议会信用作为保障，并依托英格兰银行及日渐成熟的金融市场发行。分散、闲置的私人财富才能被迅速汇集成支持战争的洪流。正如笛福所言：“破坏国家信用就是破坏战争本身，没有信用……法国将获得优势，让我们沦为暴政的猎物，成为被敌人征服与削弱的奴隶，正是信用的力量让法国做出难以置信的让步。”^{[8]302}信用经济的意义并不只在于替国家筹措军费，它还改变了商业社会中货币不足时的交易方式。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购买政府债务后，这些银行券随着放贷、贴现和资产购买进入市场流通，只要公众相信银行能够如约兑付，银行券便不会立即被兑现，而是作为支付手段在交易中反复转手^[9]。商业活动得以不再完全受制于金属货币的实际存量，这极大地释放了受货币短缺压抑的市场活力。汇票等信用工具也发挥了类似作用。传统长途贸易依赖金银运输，不仅成本高，还面临遗失、劫掠和兑换不便等风险。汇票则把支付义务转化为可转让的信用凭证，使商人能够在异地完成结算，极大促进了18世纪跨洋殖民贸易的繁荣。

这场金融变革亦内含巨大风险，政治斗争、商业欺诈与狂热投机酿就了南海泡沫危机。1711年，执政的托利党为了巩固自身地位，同时抗衡由辉格党支持的英格兰银行，开始借助南海公司重新安排国家债务问题。其核心做法，是以南海公司的股票置换国家债务。在1720年的债股转换方案中，由于议会没有规定固定的转换比率，南海公司便可以按照股票市价认购国债。这样一来，公司就有动力继续推高股价，并从由此形成的投机空间中获利^{[10]60}。然而，公司的股价繁荣并没有可靠的商业活动作为支撑，更多

是由投机心理和虚幻预期推动起来的。例如,该公司反复夸大自身在南美贸易中的特权和潜在收益,但实际上,它在《乌德勒支和约》(*Treaty of Utrecht*, 1713)中获得的南美贸易权相当有限,无论贸易规模还是实际收益,都难以支撑公司所宣称的巨额利润^[645]。所以,南海公司股价的持续上涨主要是依靠发行新股、分期认购等金融安排,不断吸引投机资本入场。到后来,股价上涨本身反而成了投资者继续买入的理由。1720年前6个月,南海股票价格上涨了8倍。在这种市场气氛中,“信用”仿佛成了一种新的财富炼金术,许多人都相信自己能够借此迅速致富。即便是公开批判金融利益集团的“斯克里布勒斯俱乐部”(Scriblerus Club)成员也未能免俗。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不仅购入南海股票,还代友人管理1000英镑投资;约翰·盖伊(John Gay)甚至将诗集出版的收益悉数投入其中^{[10]54, 68}。然而,由投机情绪推高的繁荣毕竟缺乏坚实根基。南海公司股价短暂冲顶后便急速坠落,当狂热退去,整个社会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危机很快渗入文学与公共文化的表达之中。诗歌、版画、小册子和戏剧等作品纷纷以讽刺的方式回应这场金融灾难,将投机热潮描绘为社会理性失控、价值秩序颠倒的征候,揭露出所谓虚幻财富背后所隐藏的贪婪、欺骗与荒诞。

英国社会以公民人文主义话语反思和批判信用经济,把金融变革视为美德与自由的威胁^{[11]426}。公民人文主义主张,公民美德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能充分实现,而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个体的独立与闲暇。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成年男性公民通常依托家庭劳动分工,由女性与奴隶承担劳动,从而获得参与公共事务所需的闲暇。18世纪英国公民人文主义者则将拥有“坚实”的土地视为参与公共领域的前提。相反,信贷这种“流动”的财富形式则被认为可能损害公民美德。在批评者眼中,信用经济的根基是虚拟的,“金钱利益”阶级的财富不再是“土地、货物,甚至不是金银,而是对在不确定的未来偿还债务的纸质承诺”^{[10]7}。在他们看来,国债、信贷工具和股票市场都离不开“信用”这一面向未来的承诺。巨额国债近似于寅吃卯粮,其价值建立在国家承诺和公众信任之上。纸币发行又常常超过银行实际金银储备,其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债权人不会在同一时间要求兑现票据。股票市场则使投资者逐渐离开工厂、田产、航运等较为具体的事业,转而押注尚未到来的远期收益。此外,批评者还认为,信用经济会削弱公民自由,造成新的经济依赖关系。在不断征税与借贷的过程中,政府越来越难以摆脱债权人和金融中介的影响。议会与财政运作也可能受到伦敦金融精英和大型股份公司的牵制。1710年的银行危机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英格兰银行股东曾以维护信用稳定为由,干预王室的人事安排,甚至通过拒绝为军队提供贷款来向政府施压^{[12]64}。尽管18世纪经济自由主义日益兴起,东印度公司、英格兰银行与南海公司仍凭借同政府之间的债务关系,维系各自的商业垄断。由此,在公民人文主义批评者看来,金融革命不仅可能强化寡头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也会进一步挤压普通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空间。

批评者将矛头指向信用经济引发的道德危机,指责它以国家的名义把赌博的逻辑常态化,将投机的精神注入全民血脉。威廉·霍加斯创作出版的讽刺版画《彩票》(*The Lottery*, 1721)正是这一批判情绪的典型表达。画面的上半部表面上庄严而有序:其中,“国家信用”倚靠“正义女神”端坐高处,她身后悬挂着皇室画像,暗示国家权威的担保;右侧,蒙眼的“幸运女神”正在转动抽奖轮盘。这一系列场景实际上指向英国政府为缓解庞大公共债务而推行的彩票融资方案。当时,受托利党政府雇佣的商人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设计了国家彩票计划,帮助政府筹措资金。布朗特的方案不仅降低了政府亏损的风险,还借助广告宣传和设置高达2万英镑的头奖,来诱导民众将购买彩票视为迅速致富的机会^[13]。由此,国家彩票便成为一种充满道德争议的融资方式。政府不再只是向少数富裕精英借贷,而是面向社会大众兜售一夜暴富的幻想。霍加斯的批判意图在版画下半部分变得尖锐:画面左侧,一名男子绝望地举着写有“空白”的彩票;右侧,一名手持金袋的男子似乎得到“天使”眷顾,却又被长角的“魔鬼”拖行;画面中央的船锚则象征南海公司,而南海公司也正是布朗特参与推动的另一项金融创新。从整体看,版画呈现出“经济与道德在空间上的迅速跌落”^[14]。在当时语境中,“南海”已几乎等同于商业欺诈和经济非理性。国家彩票所激发的投机侥幸心理,很快与金融市场中更复杂、更隐蔽的投机活动汇合,共同构成了一幅令道德经济批评者不安的“非理性”社会图景。正如罗伊·波特(Roy Porter)所描述的,“英国陷入赌博狂

热……花上几英镑，就有人敢挑战计时赛跑、狂饮数品脱酒，或生吃活猫”^[15]。在批评者看来，购买彩票与伦敦交易巷中股票经纪人的投机行为并没有根本区别。这二者都试图以较小投入换取高额回报，而这种回报又往往被认为脱离了真实劳动。

辉格党作家巧妙地化用女性化的信用经济话语，为当时颇具争议的信贷市场辩护。18世纪英国的财富观念里存在一套性别化想象。土地被视为坚实、稳定、可继承的财产形态，带有较强的男性化意味。信用财富则建立在承诺与预期之上，既难以触摸，也不易固定，便常被写成易变、诱人而危险的女性形象。J. G. A. 波考克(J. G. A. Pocock)指出，这类女性化修辞可以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中的命运(Fortuna)与幻想(Fantasia)等女神形象，她们象征着“世俗事物在人类意志、欲望和激情作用下不稳定的特质”^[11453]。波考克亦困惑于一个“惊人的发现”，热衷于使用这种女性化修辞的，并非反对信用经济的托利党作家，而恰恰是处于相反阵营的辉格党作家^[11452]。特里·穆尔克雷(Terry Mulcaire)对此作出解释，辉格党作家虽然意识到信用是“意识形态焦虑的根源”，但“更将其视为新兴自由市场社会中关键的政治经济资源”^[16]。笛福在小册子中塑造的“信用女士”形象，正可放在这一语境中理解。他写道：“金钱有个妹妹，是贸易有用且勤勉的仆人，……但哪怕稍受冷落，她便会阴郁、病弱、性情乖戾，且会长时间出走”^[17]。“信用女士”身上这种矛盾的笔触显示出新经济形式的两面性，它能够促进财富创造与市场繁荣，也可能引发财富幻灭和金融崩溃。不过，笛福借用女性化修辞，并不意味着他要简单地否定信用经济。相反，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说明信贷市场已不同于围绕自然需求及其有限满足而运转的传统市场。信用市场更依赖想象、期待、攀比以及由此不断扩张的欲望。换言之，自由市场理论的兴起正意味着“欲望与想象”的联盟取代了“欲望与自然需求的联盟”^[18]。因此，信用的女性化表达固然保留了危险、诱惑和不确定性的意味，但“信用女士”也把原本抽象难测的市场焦虑转化为一个可以观看，可以叙述，也可以被情感化理解的形象。

敏感的“信用女士”被塑造为审视王国健康的晴雨表，用以批判党派斗争和专制干预对自由信用市场造成的损害。1710年，安妮女王罢免辉格党财政大臣，转而依靠托利党重组权力格局。消息传出后，伦敦金融城很快出现震荡，债券和股票价格应声下跌。笛福立即借助“信用女士”表达自己的忧虑。他写道，平日里“她总是笑靥如花，愉悦开朗。日常穿行于银行与国库、交易所与财政部”^{[8]285}。可是一遇政治动荡，她便患上“跌倒病”，英国也跟着“陷入病态期”，“私人事务陷入瘫痪般的麻木，公共事务染上躁狂的热病”^{[8]285}。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笛福已经开始为托利党撰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经济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向^{[12]88-89}。借助“信用女士”的“病症”，笛福写出了信用体系的脆弱与敏感，也暗示它应当保持相对的独立与自由。公共信用不应受某一党派的控制，而应免于政治风向起伏的影响。后来，辉格党作家约瑟夫·艾迪生进一步拓展了“信用女士”的政治含义。他把信用经济同“光荣革命”的政治遗产联系起来，借此批评托利党与斯图亚特詹姆斯党之间暧昧不清的勾连。在辉格党叙事中，詹姆斯党意味着天主教、专制，以及反革命自由原则等负面元素。《旁观者》(*The Spectator*, 1711)中，“信用女士”被“暴政”“无政府”等幽灵围困，身旁的钱袋如同气球一样迅速干瘪；直到“自由”与“君主制”携手出现，她才恢复气色，“柴捆与纸堆”也重新化作真金白银^[19]。在艾迪生等辉格党作家看来，若将国家金融稳定寄托于一个同情詹姆斯党的政府，便等于把公共信用交给反复无常的专制权力。因此，“信用女士”这一形象固然带有一定的党派色彩，但它同时参与塑造了一种健康的信用市场想象，即理想的信贷市场应当尽量摆脱专断权力与党派斗争的干扰。

二、信贷实践、商业信用与道德情操的必要性

至18世纪，信用工具已经深刻融入英国贸易，《罗克珊娜》也频繁围绕各类信用符号展开情节。早在中世纪，不同阶层的人们便已身处信用网络之中，借贷、担保和债务义务无处不在。不过当时的信贷活动较为分散，多依赖熟人关系维持，信贷工具也多为口头协议或简单的书面记录。金融革命以后，英格兰银行开始运作，相关金融立法逐步完善，可流通、可转让的商业票据大量进入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信

用逐渐“主导了市场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塑造与理解”^{[20]95}。小说中珠宝商为追求罗克珊娜拟定的“书面契约”,可解读为这一历史变化的缩影。这份契约承诺了“以妻子之礼对待并供养”罗克珊娜,又列入防止男方背弃的“罚则条款”^{[1]42}。随后,商人将“装有 60 枚几尼金币的丝质钱袋”抛在罗克珊娜“膝上”,并以“亲吻与爱的誓言”结束了这场“商业谈判”^{[1]42}。赠予“钱袋”的情节象征着早期信贷交易中的仪式化痕迹。中世纪交易中,双方常通过“亲手交付”小额“定金”来确认协议成立^{[20]106}。“定金”仪式的效力源于其象征性的约束力,“钱币载着给予者的个人特质,交换过程象征着未来履约义务所具有的人格化性质”^{[20]106}。“誓言”同样在信用关系的建立中扮演了角色。在法律保障尚不充分的社会环境中,誓言常常同宗教承诺相连。人们畏惧神罚,也顾忌名誉受损,这些压力都可能强化约定的执行力。相比之下,“书面契约”更能体现 18 世纪信用经济的新变化。它不再只依靠仪式、誓言或个人信誉,而是把情感关系明确写入法律条文和经济责任之中。罗克珊娜起初百般推拒,最终仍决定委身于珠宝商,正说明这份契约的吸引力并不只来自情感承诺,更来自其背后的法律效力和经济保障。笛福借这场私人关系的谈判,将 18 世纪英国信用交易的若干关键形式压缩进一场私人关系的谈判中。

罗克珊娜虽一度拥有大笔实物财富(货币),却仍在商业领域举步维艰,该情节隐指当时英国因货币短缺与劣质化引发的商业困境。大航海时代以来,贸易规模持续扩张,对流通中的货币需求也水涨船高。但金银供应始终有限,无法完全满足日益活跃的商业交换。重金主义者坚持货币具有“内在价值”,认为货币价值来自所含的贵金属^[21]。受此观念影响,多数君主不愿意使用贱金属大量铸币。同时,硬币在长期流通中又不断磨损,由于银价高于币面价值,裁剪、熔化硬币便成为投机者获利的手段,“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随之加重。英国于 1696 至 1699 年推行“货币大重铸”,正是试图回收残损银币,重新铸造足值的标准货币^{[6]38}。但是这一措施短期内并未缓解流通压力,反而使劣币、标准钱币和假币同时出现在市场上,人们在日常交易中疲于判断货币的成色。小说中,实物财富(货币)的出现往往伴随灾难与困阻,似乎在暗示贵金属货币已无法应付现实商业需求。女主人公的第一任情人总是随身携带装满珠宝的“鲨鱼盒子”^{[1]51},这种过于醒目的财富直接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他遗留的珠宝反令罗克珊娜被误认为劫匪,险些身陷牢狱。法国亲王赠予她的大量金银珠宝,看似价值不菲,却既不便用于日常交易,也难以携带或转运出境,最终成为罗克珊娜早期商业实践中的累赘。正如批评家黛德丽·林奇(Deidre Lynch)所言,在笛福生活的时代,货币既是商人按枚清点的东西,也是因怀疑而选择性称重(用牙咬、敲击听声响)的东西^{[22]91}。金银货币的短缺和劣化,使现实交易充满猜忌和防范。当传统货币难以充分履行交易媒介的功能时,一种更便捷,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货币形式也就呼之欲出。

罗克珊娜通过将实物财富转化为信用票据摆脱了困境,该情节可看作对当时英国货币困境的隐喻回应。16、17 世纪的英国长期面临货币短缺难题。金银供应不足一方面强化了重金主义关于货币“内在价值”的观念,使人们反复追问货币价值的真正来源;另一方面,现实交易又迫使商人越来越多地使用信用工具,不同市场主体之间逐渐组成了复杂的信用网络。到 17 世纪上半叶,市场中信用交易与钱币交易的比值已高达 11 比 1^{[23]18}。于是传统货币观念出现松动,社会开始反思,货币是否必然依赖贵金属的内在价值,抑或可以建立在相互承诺和社会接受之上?在此背景下,哈特利普派(Hartlibians)^①提出了与重金主义完全对立的方案^{[23]44}。他们认为,货币能“激活自然和人类中休眠的资源”,扩大货币存量不仅可以缓解短缺问题,更是“引入了可以无限促进增长与变革的机制”^{[23]45}。甚至货币的发行也不必过滤其内在价值,只要有社会信任和部分实体资产支撑,便可以进入流通^{[23]45}。这一思路为后来的非金属货币提供了理论空间。进入 18 世纪以后,英国陆续出现了不依赖金属质地的“货币实验”,其中既包括私人制作的“贸易代币”,也包括新兴金融体系中日益增多的信用工具^{[22]91}。若在此历史语境中审视小说中主人公与荷兰商人相遇的情节,便不难发现其中的信用经济意味。笛福写到,罗克珊娜在荷兰商人的帮助下,将实物财富转换为可跨国兑现的“支票”^{[1]21}。这不仅使她避免了毁灭的命运,也让她能够开启作为信贷商

① 该团体以培根主义和炼金术思想为指导,笃信一种无限进步的世界观,主张人类可以控制自然并加速其固有发展进程,而货币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人的成功生涯。由此可见，在笛福的叙事中，信用工具不仅是罗克珊娜摆脱危机的手段，也象征着英国在货币困境中转向新信用经济模式的可能性。

罗克珊娜依靠信贷业务获得经济成功，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将利息女性化并加以批判的道德经济话语。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社会便对利息抱有极大敌意。批评家阿瑟·斯通克斯（Arthur Stonex）便指出，高利贷者形象在伊丽莎白时期戏剧中“出乎意料地普遍存在”^[24]。这种敌意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来关于金钱本性的讨论。在这一传统中，金钱被认为本质上不能生育，因此，贷款收取利息被看作违反自然的行为。这种将利息与生育能力联系起来的论述，实际上就是通过将利息女性化使其带上道德贬抑色彩。道德家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Wilson）就曾直言：“金钱本是为契约交易而设的担保物，……而非如女人般能自行繁衍、诞育婴孩”^[25]。到了18世纪，信贷形式从个人借贷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国债与股票交易，金钱的“生育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信用经济的批评者继续将“钱生钱”的现象女性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依赖公众想象运转的金融体系。与此不同，笛福则通过小说的情节安排，从功利视角剖析信用经济行为。在小说中，罗克珊娜凭借“价值14000英镑的可靠抵押贷款”，每年可获得“700英镑的年利率”^{[1]164}。再加上“其他一些有价债券”，其收益高达“每年1000英镑”^{[1]164}。笛福将一位能够成功经营金融事务的女性人物送入公众想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将信贷行为女性化并加以谴责的说法。他引导读者关注财富增长的结果，而不是“钱生钱”是否合乎自然的问题。当女性也能从容驾驭信用体系时，该体系的“非自然”色彩便自然消解。正如笛福在商业小册子中指出的：“商业中有一条格言，钱能生钱”；“那些既不给予信用，也不接受信用的人，……尚未出生，即便有过也早已死去”^{[26]204, 208}。

笛福意在呈现一种新型的商业伦理，表明个体良好的道德与经济形象是获得商业信用的关键。批评家桑德拉·谢尔曼（Sandra Sherman）指出，18世纪“信用”的隐喻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指向在市场中流通，需由多人背书的物质性工具；其二指向声誉，属于道德范畴，即个人因诚实、可靠而获得的经济信誉^{[27]328-329}。《罗克珊娜》显然没有停留在信用的工具性层面，小说更在意的是，各个市场个体怎样把自己塑造成值得信任的人。罗克珊娜刻意隐瞒自身婚姻与情史，又屡次改写自己的出身、姓名、阶层和信仰。借助不断地自我重塑，她得以摆脱旧身份，一再赢得他人信任，顺势进入新的情感（商业）关系中。在一处颇有意义的情节中，法国亲王试图拭去她的泪水，却又突然收回了手。罗克珊娜心领神会：“您吻过我这么多次，难道不知我是涂脂抹粉还是素面朝天吗？请殿下亲自确认，免得遭受欺骗”^{[1]172}。这一“道德自证”的举动表明，经济信誉需要借助可见的外在形象加以确认。在信用关系中，声誉不能只停留在自我声明中，它必须以某种可见的形式呈现出来，接受他人的观看和检验。这不仅包括诚实可靠等道德形象，也包括富足又稳定的经济形象。笛福本人的经历也可作为旁证。他曾有过失败的商业经历，多次面临破产和账单诉讼，生活一度十分拮据。即便如此，他仍努力维持成功的对外形象，不仅雇佣五名仆人，还通过佩剑、戴假发和钻戒来模仿体面的上层绅士^[28]。可见，在笛福所处的时代，个人信用往往依赖一整套可被他人识别的外在迹象来维系。“信用”不仅关乎经济能力，也包含道德评价，二者共同影响着他人对其偿债能力与可靠程度的判断。

《罗克珊娜》揭示了个体的信用声誉不仅是个人品格，也是社会交往与情感评价共同建构的产物，这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道德情操理论遥相呼应。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中指出，人类的道德情感和行为规范，与内心中那个想象出来的“公正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密切相关。他是“良心的法庭”“人类行为的伟大的审判员和仲裁者”，象征着人们内心中一种理想化的、不偏不倚的评价标准^[29]。人们渴望获得这个内在法官的赞许，也会尽力避免受其谴责。这个“公正旁观者”来自社会交往经验，是人们对邻里、交易对象等真实“外部旁观者”的反应的内化。尤其在紧密相连的信用网络中，个人的言行也始终处在他人的观察和评议之下。在信用经济中，交易往往依赖延期支付和个人承诺。因此，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资本和技艺，也取决于他是否拥有能够赢得他人信任的公开声誉。正如该时期商人威廉·斯科特（William Scott）在论述布匹贸易时所言，商人的正直生活应接受他人的评判，而他本人也应坦诚其良心，过一种“仿佛时时处于公众之中”的生活^[30]。

小说中的荷兰商人,也就是罗克珊娜的第三任情人,正可以看作这类正直信贷商人的代表。荷兰商人“素以富有和诚实而享有很高的声誉”^[111],罗克珊娜亦称,“我可以将我的所有财产托付于他,因为他极为诚实,于我毫无任何坏念头”^[1120]。正因如此,荷兰商人为她开具的支票在鹿特丹被立刻“如期如数兑付”,甚至被拒付的汇票也被其友人垫付,理由是“为了维护背书人的信誉”^[1131]。这一情节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形成呼应:信用体系要稳定运行,离不开道德信任;而这种信任又是在旁观者的目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然而,罗克珊娜的致富路与新声誉潜藏着欺骗与虚构,其悲剧结局呼应了南海泡沫灾难,警示道德情操之于信用经济稳定的重要价值。南海泡沫之后,英国社会对信用经济的态度明显转为疑惧。它不再只是一个能够带来利润的新兴经济模式,也开始被视为充斥着欺诈与投机的危险体系。究其根源,正在于南海公司为推高股价许诺的虚假贸易前景,即与西属南美殖民地开展利润高昂的垄断贸易。与此相似,罗克珊娜的致富过程也离不开欺瞒和表演。她隐瞒身份,抛弃子女,通过不断调整自身形象,在男性欲望主导的关系中积累资本。“罗克珊娜”(Roxana)亦非其本名,而是她在假面舞会上身着土耳其服饰表演后获得的“艺名”^[11176]。这一名称具有波斯语源,在当时语境中容易让人联想到遥远、奢华的异域财富。它与“南海公司”这一名称相似,二者都借助地理想象,唤起人们对海外财富的期待。因此,当被自己抛弃的女儿不断追寻时,罗克珊娜因真相迫近而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维护谎言甚至间接导致女儿的死亡。在小说结尾,她暗示自己“接连遭遇了毁灭性的灾难”^[11329],形成了一种个人层面的“泡沫破裂”。谢尔曼指出,18世纪的道德家借助“信用”所兼具的经济与道德双重属性来“建构市场诚信”,通过将道德原则转化为衡量标准,以规训变化莫测的信贷市场^{[27]328}。这也是笛福小说为金融灾难后社会“信任崩塌”恐惧所作的回应。其实,早在泡沫发生前,笛福便已为“信用女士”构建充满道德蕴意的家族谱系。他写道,“审慎与美德是两姐妹”,各育有一女,二者极为相像,这两位女儿便是“信用”与“声誉”^{[18]272}。笛福借此表明,信用经济具备伦理层面内涵,必须以道德德性为基础。信用市场若要健康运转,也离不开社会成员的道德品格和自我约束。

三、婚姻抉择、国家编码与政府信贷滥用焦虑

女主人公拒绝进入男权婚姻,而是在市场中充分利用其自由身体获利,隐喻了其作为一名信贷商人对于自由市场环境的渴求。罗克珊娜将自我视为其唯一且最重要的资本资产,其核心目标便是确保这项资产的流动性与增殖能力,而婚姻恰构成了实现该目标的最大阻碍。她严词拒绝了荷兰商人的求婚,直言:“当一位女性尚单身时,其政治身份实为(自由的)‘男性’;她对自己的财产拥有完全支配权,对所行之事有完全的决定权,能实现一个男人可以企及的愿望与目的”^[11148]。事实上,尽管十八世纪早期英国的司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已婚妇女在涉及独立财产事务时可被视为“独身女性”,从而保有一定的财产自主权,但至十八世纪末,这一权利逐渐被视为“无法容忍”^[31]。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在《汤姆·琼斯》(*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 1749)中便以菲茨帕特里克先生(Mr. Fitzpatrick)为例,描绘了其夺取妻子剩余财产而将其囚禁,剥夺其纸笔与书籍,仅允许她与送饭的仆人接触的暴力行为^[32]。可见,在自由市场的信用经济语境下,小说中的独特“婚姻”是一种对强制性、非流动,且高风险的终身投资的隐喻。而与这种资产僵化的婚姻模式对比鲜明的是罗克珊娜精心构建的“情妇”经济模式,通过自我“证券化”,置身于更为灵活、自由的现代商业契约关系中。这种模式赋予了她作为经济行动者的全部自由:她可以自由评估并选择“投资者”(即情人),根据市场行情与自身价值“定价”,所得的财富完全独立于任何男性,这使得她能够像任何一个成功的商人一样进行再投资。她从巴黎到荷兰再到伦敦,其行踪轨迹不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象征资本在跨国流动,以规避风险,寻求新的市场机遇。

待嫁的罗克珊娜与早期的自由“信用女士”的寓言形象呼应,凸显出笛福关于信用市场应保持自由,免于专制特权干预的思想。小说中,罗克珊娜拒绝荷兰商人的求婚后重返英国,并在罗伯特·克莱顿爵士(Robert Clayton)的协助下,通过信贷业务迅速扩充资本。她与多位男性商人保持往来,却屡次拒绝罗

伯特的婚介提议。她再次宣称：“既然我拥有丰厚的财产，便无法理解‘敬重’与‘顺从’这些字眼如何能与一位自由女性的自由相容”^{[11]71}。这一表态不仅是对婚姻制度的再次拒斥，更是她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宣言。与这一情节相互照应的，是笛福在小册子中塑造的自由“信用女士”形象。这位“待嫁的女士”的一生，象征性地演绎了英国金融史的发展轨迹：内战期间，议会拥抱市场信用，将她“安置在市政厅，场面十分奢华壮阔”；克伦威尔则“擒获她、控制她，用武力囚禁她”^{[8]280-281}。复辟时期，查理二世一度“待她为情人”，却试图“给她戴上镣铐，把屋门紧锁”，最终导致信用出逃^{[33]29-30}。到了18世纪，威廉国王将其介绍给议会，为她提供了各种金融政策，却仍无法留住信用的芳心^{[33]29-30}。在安妮女王时期，财务大臣“送予她新衣，将其装扮得像一位公主，此时的她最为光彩夺目，是整个国家的情人”^{[8]284}。不难看出，笛福笔下的罗克珊娜与“信用女士”共同构筑了一套关于信用经济的自由主义叙事。“情妇”身份可以被理解为信用经济自由和自主的象征。与之相对的，是旧式重商主义和专制财政，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或国王往往像丈夫处置妻子的嫁妆一样，任意动用其金融资产。信用的“芳心”，也就是市场信心，并不能靠“镣铐”来强行获得。它只能通过稳定的制度，对契约的尊重，以及以议会为代表的法治来维系。

罗克珊娜与荷兰商人的婚姻情节，暗示笛福在信用经济语境下对提升女性经济地位与商业能力的倡导。罗克珊娜以英国人的身份直言，“婚姻契约的本质，无非是女性将自由、财产、自主权以及一切，尽数交予丈夫；此后变成‘纯粹的女人’，换言之，一名奴隶”^{[11]4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人常将“（荷兰）共和国女性的独立精神视为‘奇观’”，其根源在于荷兰女性在法律与社会习俗上均享有较大的行动自由^{[34]598}。在荷兰，即便是已婚女性，仍被承认有缔结契约的权利；寡妇则可继承亡夫的一半遗产，并代管属于子女的另一半^{[34]598-599}。这样的社会环境使荷兰女性能够较深入地参与商业生活，也使她们在“荷兰黄金时代”成为英国观察者眼中颇令人艳羡的商人群体。17世纪重商主义作家罗杰·科克(Roger Coke)便认为，荷兰女性的商业参与给“国家、丈夫与家庭带来了极大优势”^[35]。他以重商主义观点阐释其意义，相信女性的商业培训将增加国内劳动力资源。与此相对，罗克珊娜所代表的英国已婚女性则普遍缺乏商业技能。批评家D. 加巴德(D. Gabbard)重新评估了女主人公的财务素养，认为罗克珊娜不具备系统的金融知识，甚至无法读懂账目^[36]。不难发现，笛福安排罗克珊娜嫁入荷兰，成为“荷兰夫人”的情节，恰是在暗示信用经济时代的女性亟须法律权利与商业教育。笛福在《论商人应让妻子了解其生意》(*Of the Tradesman Letting His Wife be Acquainted with His Business*, 1726)中更为直接地阐明了这一立场。他主张商人的妻子应当摒弃骄傲，必要时“屈就”现实，亲自参与商业事务，这是在不确定的信用经济环境中实现自立与成功的关键^{[26]220-230}。

小说中的荷兰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它实际上编码了稳健的金融体系与发达的商业精神，构成英国经济想象中一个既可借鉴又令人不安的“他者”。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写道：“荷兰持续展现的商业实力对英国人想象力所产生的冲击，超过了17世纪其他任何经济发展。”^[37]17世纪的荷兰较早实现了金融现代化，依托银行、证券交易和各类信用安排，成为欧洲最早的金融中心之一。对17、18世纪的英国来说，荷兰金融体制既构成竞争压力，也提供了可供模仿的对象。英国金融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荷兰经验，英格兰银行的设立，国债制度的引入，以及股票交易的兴起中，都能看到荷兰模式的影子。正如J. H. 克拉潘(J. H. Clapham)所言：“17世纪的英国人总是怀着一种混杂着钦佩、嫉妒与憎恨的复杂情绪，谈论荷兰农业、造船业、工业、商业手段以及银行业的高效。”^[38]事实上，英国金融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主要发生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也就是荷兰裔国王威廉三世入主英国的时期。笛福不仅以担任威廉国王的私人助理为荣，也清楚地意识到荷兰“资本管理的优势”，以及英国效仿荷兰金融模式的必要性^{[39]42-43}。在小说中，历经海难的罗克珊娜依然选择再次出海，直言“理智指示我应前往荷兰”^{[11]129}。正是在这个将贸易锤炼为冷静而精确之术的地方，罗克珊娜习得信用经济的运作逻辑，“从一位享乐女子，变成了一名生意人。”^{[11]131}因此，小说中的荷兰不仅是情节发展的地理节点，更象征着英国对荷兰金融理性的吸纳。它表明早期资本主义英国建构自身金融秩序时，对“他者”经验的借鉴与依托。

法国则被笛福构建为消极、负面的经济符号，背后是一种过时的，基于金银实物的经济观念。批评

家布拉姆·迪克斯特拉(Bram Dijkstra)指出,在笛福眼中,“珠宝乃是前资本主义价值、财富与交换体系的象征载体”^{[39]43}。因此,罗克珊娜早期追求珠宝的情节,在他看来是一种商业上不成熟的表现。小说中出现的珠宝、银器与钱币等实体财富,几乎都与法国空间相连。罗克珊娜的第一任情人是个珠宝商,生意就在法国。第二任情人法国亲王送她的,也大多是珠宝、华服、银器和钱币。在早期现代英国想象中,法国是欧洲奢侈品的主要产地。无论是在反奢侈的清教伦理中,还是在反消费的重商主义话语中,法国及其奢侈品都背负着道德和经济上的负面意味。结合小说创造时期的信用经济语境来看,笛福笔下的法国形象其实是被编码为经济象征体系的一部分。法国的“金银”与荷兰的“票据”构成了物质与信用之间的对立。珠宝、华服和银器与法国奢靡的宫廷文化密切相关,它们的功能更多在于炫示身份,消耗财富,而不是进入市场流通并创造新的价值。小说中,法国亲王为了维护自身名誉,把罗克珊娜藏在隐秘的宅邸里。她虽然拥有华服、银器与珠宝,但能展示这些价值的地方,只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样的安排堵住了财富流入更广大商业网络的通道,把它们锁在了占有、装饰和馈赠的层面。所以,罗克珊娜始终焦虑于如何处理这些“沉重的战利品”。放在金融革命的语境中看,这种“重量”并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沉重,也象征着旧式财富形态的迟滞和笨拙。在这个意义上,笛福把法国放到了荷兰的对立面,是一个靠物质、展示和消耗来运转的旧经济模式的符号。

如果将罗克珊娜理解为信用经济的象征,那么她与法国亲王交往的情节便暗示了以专制主义为基础的,注定失败的国家信用制度。小说在叙述这段情感关系时,充满了权力与控制的意味。为了隐匿与亲王的私情,罗克珊娜选择深居简出,她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作“关禁闭”^{[1]67}。在另一处更隐晦的情节中,罗克珊娜因远行而忧虑无人照料的大量财产,亲王的应对之策是以“硕大的铁箱”将它们悉数封存^{[1]100}。表面上,罗克珊娜与亲王的关系似乎稳定而体面,有宫廷庇护的色彩。然而笛福在叙事中屡次采用暗示强权与控制的语言,令人联想到法国依托君主专制建立起来的国家信用体系。史学家托马斯·凯泽(Thomas Kaiser)在研究约翰·罗(John Law)18世纪法国的金融实验时指出,该体系依赖君主的绝对权威来维系公众对国家信心的信心^{[40]2}。1718年,罗的财政改革遭到高等法院的抵制,摄政王遂以专断手段逮捕并流放法官,强行推行纸币制度^{[40]12-14}。同一时间,政府不仅禁止大额银币交易,还设立告密制度,惩处一切贬损纸币的言行^{[40]16-17}。在国家权力的护持下,罗的信用金融体系得以迅速推行,一度缓解了法国的财政危机。然而,信用的本质是一种以公众信任与心理预期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其有效运作有赖于自由的社会互动与舆论共识。1720年密西西比泡沫的破裂,象征着这种以专制取代信任的信用模式的彻底崩塌。几乎在同一时期,英国亦经历南海泡沫的金融灾难。笛福显然洞察了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并借由《罗克珊娜》的叙事批判了那种以权力取代自由,以国家强权替代公民信任的制度幻象。

小说对伦敦西区的书写带有法国象征色彩,折射出作者对政治权力滥用信贷的深层焦虑,可谓16、17世纪英国国家焦虑的延续^[41]。批评家大卫·布莱韦特(David Blewett)曾指出,《罗克珊娜》的故事背景存在双重时间结构。笛福一方面将背景设置在查理二世时期,又处处暗示罗克珊娜于1715年前后在伦敦活跃,从而借奢靡的斯图亚特宫廷图景批判汉诺威早期英国的政治生态^[42]。小说中,重返英国的罗克珊娜定居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地处王公贵族居住的伦敦西区(West End),而非商人与银行家聚集的伦敦金融城(The City)。正是在这个“极度奢华热闹”的领域^{[1]172},罗克珊娜成为“假面舞会”上的交际花,甚至最终成为英国国王的情妇。这一情节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查理二世时期的宫廷生活,而她在舞会上表演法国舞蹈,又进一步把伦敦西区同法国式奢靡风气联系起来。由此,小说中的西区被描绘成为权力、欲望和信用可能被滥用的场所。这种象征在罗克珊娜结束与国王的隐秘关系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她形容自己像“被珍藏多年的老银器,已黯然无光、色泽尽失”^{[1]182}。此处的比喻暗示了信用经济(女士)在英国遭受权力滥用的现状。事实也恰如此,18世纪初的英国信用体系深受权力滥用与党派斗争之害。1702至1714年间,安妮女王在辉格党与托利党之间摇摆不定,党派轮替使具备不同党派背景的南海公司与英格兰银行股票屡受波及^{[23]221}。南海泡沫事件同样有着权力滥用的诱因。乔治一世即位后被任命为南海公司总督,他亲自购入10 000英镑股票,从而成为主要股东,此举无疑助长了民众的非理性投资

热情。1720年的《泡沫法案》(*Bubble Act*)则是在南海公司的游说下通过的,以限制未经特许的股份公司发行股票,从而维护南海公司的垄断地位。政治权力与金融利益的这种结合,最终削弱了市场信心,并在股票抛售中加速了泡沫破裂。

四、结 语

英国财政大臣约翰·艾斯拉比(John Aislabie)为自己卷入南海泡沫事件辩解时,曾称自己“被一种与自身迥异的精神所驱使,是一种契合当时狂热氛围的精神状态”^[43]。“狂热”一词凸显了18世纪早期英国社会在道德经济的视野下对这场金融灾难的普遍反思。在这一层面,笛福显然走得更远。在多部作品中,他均在支持自由信用市场的同时,对其潜在风险保持审慎考察。泡沫破裂后,自由的信贷体系遭受广泛质疑,笛福借《罗克珊娜》重新思考信用经济行稳致远的条件。小说以隐喻方式呈现信用体系相较于传统货币经济所具备的优势,更强调唯有坚持理性、节制与责任等“道德情操”,方能避免虚妄信用与投机泡沫的滋生。尽管“18世纪早期的伦敦股票市场接近经济理论所描绘的理想(自由)状态”^[44],然而,笛福以小说主人公为信用经济的拟人化象征,借其命运揭示政治特权与党派纷争对信贷市场造成的破坏。因此,笛福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正式提出,因而将自由而稳定的市场环境视为信用经济平稳发展的必要条件。或许笛福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其悉心“呵护”的“信用女士”会在维多利亚时期发展壮大,工业与银行的垄断资本结合形成金融资本主义格局,“金融帝国”成为英国全球影响力的经济新形态。尽管历史已然远行,笛福所关注的道德边界与权力约束问题,仍是后世构想金融资本文化时不可回避的核心议题。

参考文献:

- [1] Defoe D. *Roxana: the fortunate mistress*[M]. Mullan J,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Healey C L. "A perfect retreat indeed": speculation, surveillance, and space in Defoe's *Roxana*[J].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2009, 21(4): 493-512.
- [3] Sherman S. Lady Credit no lady; or, the case of Defoe's "Coy Mistress," truly stat'd[J].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1995, 37(2): 185-214.
- [4] Defoe D. *An essay upon projects*[M]. Kennedy J D, et al., eds. New York: AMS Press, 1999.
- [5] Dickson P G 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M]. London: Routledge, 2016: 12.
- [6] Roseveare H.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M]. London: Routledge, 2013.
- [7] Brewer J.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M]. London: Unwin Hyman, 2005: 22.
- [8] Defoe D. *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British nation: volume 7*[M]. McVeagh J, ed.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9.
- [9] Quinn S. *Money, finance and capital markets*[M]//Floud R, Johnson P,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7-174.
- [10] Nicholson C. *Writing and the rise of finance: capital satires of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1]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12] Kramnick I. *Bolingbroke and his circle: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age of Walpol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13] Carswell J. *The South Sea Bubble*[M]. Dover: Alan Sutton, 1993: 44.
- [14] Swords T J. Daniel Defoe's literary economies: the shifting role of narrative uncertainty, speculation, and providence in *Robinson Crusoe* and *Roxana*[D]. Appleton: Lawrence University Honors Projects, 2016: 55.
- [15] Porter R. *English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8: 255.
- [16] Mulcaire T. Public credit; or, the feminization of virtue in the marketplace[J].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9, 114(5): 1029-1042.
- [17] Defoe D. Defoe's review: facsimile book 6, January 1, 1706, to May 4, 1706 of volume III[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102-103.

- ty Press, 1938: 17.
- [18] Caygill H. Art of judgement[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90.
- [19] Addison J. The Spectator: vol. 1[M]. Bond D F, e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65: 16–17.
- [20] Muldrew C. The economy of obligation: the culture of credit and social rela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M]. New York: Palgrave, 1998.
- [21] 陶久胜. 英国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价值焦虑——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的货币、商品与国家安全[J]. 社会科学研究, 2024(1): 181–193.
- [22] Lynch D S. Money and character in Defoe's fiction[M]//Richetti J,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iel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84–101.
- [23] Wennerlind C. Casualties of credit: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1620—1720[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24] Stonex A B. The usurer in Elizabethan drama[J].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16, 31(2): 190–210.
- [25] Wilson T. A discourse upon usury(1572)[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5: 286.
- [26] Defoe D. The complete English tradesman: vol. 1[M]. McVeagh J, ed. London: Pickering and Chatto, 2007.
- [27] Sherman S. Promises, promises: credit as contested metaphor in early capitalist discourse[J]. Modern Philology, 1997, 94(3): 327–349.
- [28] Backscheider P R. Daniel Defoe: his life[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51, 128.
- [29] Smith A.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M]. Raphael D D, Macfie A L, ed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4: 130.
- [30] Scott W. An essay of drapery(1635)[M]. Boston: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953: 17.
- [31] Staves S. Married women's separate property in England, 1660—1833[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2.
- [32] Fielding H. 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ling[M]. Battestin M C, Bowers F, eds.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5: 599–600.
- [33] Defoe D. A re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English nation: volume 3[M]. J. McVeagh, ed.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5.
- [34] Vries J D.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5] Coke R. A discourse of trade(1670)[M]. Yorkshire: S. R. Publishers Ltd., 1970: 75.
- [36] Gabbard D C. The Dutch wives' good husbandry: Defoe's *Roxana* and financial literacy[J].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004, 37(2): 237–251.
- [37] Appleby J O. 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73.
- [38] Clapham J H. Editorial preface[M]//Wilson C. Anglo-Dutch commerce and fin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ix–xi.
- [39] Dijkstra B. Defoe and economics: the fortunes of Roxana in the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87.
- [40] Kaiser T E. Money, despotism, and public opinion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John Law and the debate on royal credit[J].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1991, 63(1): 1–28.
- [41] 陶久胜. 英国 16、17 世纪文学中的疾病意识与国家焦虑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304–305.
- [42] Blewett D. Introduction[M]//Defoe D. *Roxana: the fortunate mistres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2: 9–25.
- [43] Aislabie J. Aislabie's second speech on his defence in the House of Lords, on Thursday, July 20. 1721[M]. London: J. Roberts and J. Graves, 1721: 12.
- [44] Carruther B G.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70.

[责任编辑: 张雨晗]

Anxieties in the early British capitalist credit economy: government credit, moral sentiments, and the free market in *Roxana*

Tao Jiusheng¹, Yin Bo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era of liberal capitalism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English Parliament established perpetual government bonds backed by the national credit. Whil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inancial and credit operations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commerce, it also aroused public concern over government credit. A credit-based economy was believed to lack substantive value, and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the stock market, mingled with the abuse of government credit, would lead to a severe social crisis. In *Roxana*, the eponymous heroine, like all European merchants actively engaged in credit transactions at the time, carefully constructed a favorable moral and economic image in order to enhance her personal credit. Her successful commercial practices demonstrated the magical wealth-multiplying capacity of the credit economy and highlighted the crucial role that the moral sensibilities of rational economic agents played in the credit market. Through *Roxana*'s marital choices and the contrasting metaphors embodied by her prospective suitors representing the French and Dutch nations, Defoe sheds light on the fact that partisan strife had spread from the English Parliament to London's Exchange Alley. He implies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s defense of the free credit market and expresses English society's anxiety over government credit and the stock market.

Key words: *Roxana*; Daniel Defoe; credit economy; moral sensibility; free market